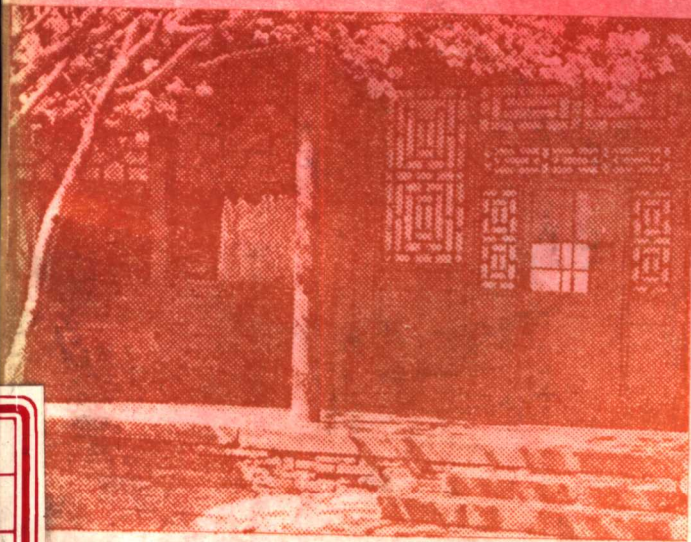


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吴家林 谢荫明 著



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吴家林 谢荫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吴家林 谢荫明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市华生印刷厂排版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9.375 插页2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36 000 册数: 1-5 000

*

ISBN7-300-01085-7

K·103 定价: 4.10元

目 录

序 言	丁守和	1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的北京		4
一、悠久的历史，著名的古都		4
二、鸦片战争后北京的政治与经济		5
三、五四运动前夕的北京社会		9
第二章 北京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和产业工人的出现		17
一、北京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和发展		17
二、北京产业工人的成长		20
三、大量手工业及服务业工人的存在		23
四、北京工人的自发斗争		26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31
一、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31
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44
三、五四运动在北京的爆发		50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60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传播		60
二、与胡适改良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		71
三、北京社团的兴起及其作用		76
第五章 北京党组织的酝酿		91
一、陈独秀李大钊酝酿建党		91
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及活动		94

三、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100
第六章 北京党组织的成立	105
一、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内部的斗争	105
二、对小组成员的考证及对他们政治思想状况的 分析	106
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传略或简介	113
第七章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	170
一、继续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	170
二、深入开展工人运动	176
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181
四、帮助进步社团确定政治方向	185
五、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	189
第八章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
一、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
二、北京参加“一大”代表的产生	198
三、北京小组代表在党的成立大会上	203
四、“一大”后北京党的工作	214
第九章 中共北京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219
一、共产国际对北京先进分子的影响	219
二、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 来的	225
三、中共北京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231
对北京早期党组织的研究及其地位、作用的评价	243
一、研究的历史过程	243
二、研究的现状	248
三、北京早期党组织的特点、地位和作用	254
北京早期党组织创立时期的部分资料、论文、书目索引	260

一、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60
二、五四时期的社团、刊物	269
三、北京党的活动	272
四、人物	275

序 言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从古至今，北京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组织的建立，与上海等地党组织相呼应，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然而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政权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人民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就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先进分子发动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展开了勇猛的进攻，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广大青年中掀起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潮，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思想准备。

由北京开始的五四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新的革命高潮，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开端。正如身临其境的瞿秋白所说：“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她。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是由北京首先开始的。

《新青年》、《晨报》副刊等刊物及当时的许多进步社团都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的学说，并且把这种学习同爱国活动及社会改造的讨论联系起来，探讨中国的出路。一些先进分子批评了当时的各种错误思想，开始到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就是在这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万事开头难！从辛亥革命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学说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小组诞生，这中间，有多少有胆有识的英杰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唤醒沉睡的同胞，经历了多么艰难曲折的历程，探索 and 追求，终于冲破时代的闸门，开拓出一条通向光明的路。生活在新时代的青年，对黎明前的黑暗，对革命先烈披荆斩棘的艰辛历程，可能还不清楚。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吴家林教授、谢荫明助理研究员二同志的努力，再现了这段重要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历史，离不开事件和人物，离不开空间和时间。任何物质运动，包括人类社会的运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没有对事件、人物和团体组织的深入研究，就难于具体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发展过程，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说，北京史的研究内容，又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北京党史的研究，无疑可以促进对全国党史研究的深入和理解。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研究，是具体史实的研究，因其具体，故需要资料尽可能详细和全面系统。这是十分艰巨的工作，它不仅要對浩繁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考证和研究，同时要靠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进行，长期积累。吴、谢二同志进行坚持不懈的研究，并吸收近几年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写成此书。这是值得祝贺的。

该书是关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一本专著，资料翔实，层

次清楚，文字简练，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它既是一本史书，也是一本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因此，我愿意向大家推荐它。

丁 守 和

1990年12月于北京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的北京

一、悠久的历史，著名的古都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诞生在具有悠久历史、世界著名的城市，产生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

70万年前，“北京人”的出现揭开了北京历史的序幕。在燕山脚下，华北大平原的北端这片依山面海的土地上，勤劳、勇敢、智慧的人们世代地劳动、生息和繁衍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北京地区发掘出来的文物证明，沿续于人类进化的各个时期，从新石器时代初期，燕山南北几种不同文化融合形成燕文化开始，距今已约有1万年。而三千年前，在今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村出现的一座东西长850米，南北长600米，用土夯筑而成的长方形城廓，则标志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开始。由公元前11世纪末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到1920年时，北京曾先后为下列各代都城：燕、前燕、大燕、刘燕、辽、金、元、明、清、中华民国。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由于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原因，北京的地位不断上升。西周时，北京为方国燕的都邑。春秋战国时，燕都蓟城已发展成为名城之一，有“富冠天下”之誉。秦汉至隋唐时期，北京是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一个军事重镇与各民族通商的商业大都会。同时又是北方的文化中心，并正逐步地向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转化。辽代北京由州府升为陪都，名曰南京，又叫燕京，从此拉开了北京首都地位的序幕。至金代的中都，北京才第一次成为皇都——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动用了80

万民夫和40万兵士，历时3年之后，一座周长37余里的新城在今天北京城的西南部出现了，其规模宏大，“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尔后，元时的大都，明、清时的北京，在长达688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像古都北京这样悠久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各历史名都中居于首位，就是在世界各国著名首都中也是少见的。

北京人民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美的陶器、青铜器、玉器、铁器的制造；为解决水源、防洪和农田灌溉而修建的戾陵堰和车箱渠；为连接南北交通而开凿的北运河；制陶、制盐、冶炼、纺织、印刷及手工业的发展；天文仪器的研制；城市规划、宫殿和园林的营建等等，都显示了北京人民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智慧。并且在这些生产活动中，创造出了闻名于世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成果。其中的营造学、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绘画、雕塑、戏剧、小说、诗歌等等，都达到了当时中国和世界的高水平。出现了诸如张堪、韩婴、卢植、刘靖、高克恭、杨琼父子、刘元、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于谦、袁崇焕、徐光启、曹雪芹、李汝珍、纳兰性德、明安图、孙承泽、王源、刘献廷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通过马可波罗、利马窦等人来京的活动和介绍，加强了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

北京的历史，值得人们自豪和骄傲。

二、鸦片战争后北京的政治与经济

北京人民是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人民，在反对剥削阶级和异民族统治的过程中，北京人民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鸦片战争后，由于内外矛盾的激化，北京的政治和经济更是处于急剧的动荡之中。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战后不久签定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使帝国主义的侵略合法化，在中国南方的沿海、沿江区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侵入，半殖民地化的危机日益加深。相对而言，由于北京是封建京师，资本主义的侵入稍逊于广州、上海。而封建的压迫和反动的统治则比以前大大加剧。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和鸦片的输入造成了白银的外流，造成京师银价暴涨，物价上涨。京畿地区食用的长芦盐盐价，较之战前增加了1—3倍，甚至更多，直接影响到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1848年旗地租额提高了50—58%，封建地主的超经济剥削，使许多农民因无力缴租而失去了租种的土地。当时京畿地区被“夺种”的土地达4 000多顷，致使几千家佃户丧失生计。京师城乡经济出现一片凋敝景象。清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采取滥铸大钱、乱发纸币的办法，横征暴敛，劫取百姓钱财。由1853年开始，历时10余年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据统计，1860年京师市场上的猪肉价格，较之六七年前，上涨了6倍。香油（即芝麻油）价格上涨3倍多，硬煤涨4倍，茶叶涨5倍，蜡烛涨7倍半。

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下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853年，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太平军，以攻取北京为目标，从扬州一直打到天津地区的静海。京师内，统治者人心惶惶，清朝贵族大臣集中居住的北城一带，原有1.8万户，此刻逃得只剩下8 000余户。太平军的北伐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最终失败了，林凤祥、李开芳在北京惨遭杀害。但农民革命的气势，给贫苦的北京市民和郊区农民以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极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阶级。北伐军被镇压后，京师的防范更加森严，重新稽查了北京住户，制定了保甲法，10家为一组，联名互保。还重申了旗汉分城内城外居住的旧制，严格限制城内商业、运输业的发展、控制小贩的活动和寄宿，唯恐都城 内 义 军

再起。

与封建王朝腐朽、垂死相对应的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劫掠和对中国政治的干预。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4年之后，英法联军16 800多人由北塘登陆，攻陷天津后又向北京进犯，由于清军将领的怯懦和无能，清军先后败于通州张家湾、八里桥等地。咸丰皇帝带着后妃、王公大臣慌忙从圆明园逃往承德。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北京第一次遭到西方殖民军的野蛮蹂躏。除焚杀淫掠外，更使人气愤的是，在侵略军头子的命令下，历时150余年建造的、“世界上最宏伟美丽的宫殿”——圆明园竟被付之一炬，烈焰熊熊，三日不灭，已至京城西北，黑烟弥漫，一处人类文明的瑰宝，顷刻之间化为灰烬。这次侵略的结果，是中英、中法、中俄一项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北京遭受了空前的屈辱。从此，西方列强在北京城内建立了使馆，设立了总税务司；京师第一次出现了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枪炮掩护下开始的商业贸易，使洋货充斥于“鞑靼之下”的北京市场，京师经济、政治日趋半殖民地化。

为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圆明园被焚40年后，英、美、德、法、俄等8国又组成联军，再次武装侵入北京。封建统治者再次弃城出逃，饱受荼毒的还是京师百姓。八国联军在城内，对皇宫、禁苑以至铺户、民宅都进行了疯狂的洗掠，它给北京造成了空前的破坏。此次入侵的结果，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除割地赔款外，北京东交民巷被划为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军管理，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并将铁路一直修至正阳门前，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清政府实行控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更加加深。

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的加剧，遭到了北京人民各种方式的抵制和反对。1895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结合起来，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运动。基于对又一

卖国条约《马关条约》的义愤，康有为发动各省在京举人1300多人集会于松筠庵谏草堂，联名上书清朝皇帝，反对批准《马关条约》，主张拒和、迁都和变法。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随后，为了宣传变法，康有为等创办了《万国公报》（后称《中外纪闻》），成立了强学会、粤学会、保国会等团体，在光绪皇帝的首肯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实行了变革。尽管这些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但已经为封建顽固派所不容，变法维新仅103天，就遭到了镇压，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血溅菜市口，除京师大学堂依存外，其他革新措施均被废止，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1900年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北方农民组织起义和团，并且迅速发展扩大。6月中旬，义和团开始大批进入京师，他们到处设立坛棚，赶制刀枪，北京城内的贫民纷纷参加了义和团，并开展了禁用洋货、攻打外国使馆及西什库天主教堂的活动。义和团虽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但却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由于农民小生产意识的局限和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引，以及没有巩固的领导核心，而组织涣散、盲目排外，义和团很快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绞杀了。

接着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而起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全国包括北京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和起义。同盟会干部田桐、白逾桓等在北京创办了《帝国日报》、《国光新闻》、《国民报》、《国风时报》等报刊，以反对官僚、倡导立宪为号召，从事联络、组织反清力量的工作。在南方发动起义的同时，革命党人提出了在京师发难，实行“中央革命”的主张。但由于京师作为清王朝统治的中心，防范、控制得非常严密，革命党人的活动十分困难。加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忽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因而他们在北京的活动一直没有形成广泛的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革命派的“中央革命”，始终以暗杀活动为

主。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正阳门车站试图行刺出洋考察的清廷五大臣，不慎炸弹先行引爆，吴樾当即牺牲。1910年3月，同盟会会员汪兆铭在京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未成而被捕。这一年，在北京举行的要求召开国会、实现立宪的请愿活动就有3次，全国的在京代表都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清王朝统治的寿数已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北京弥漫着一派革命的气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一个多月的时间，关内18省已有15省宣布独立，直隶、山西等地的起义军积极地准备联合进兵北京。在危急的情况下，清廷一方面起用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准备迁都然后卷土重来；一方面寻求帝国主义军事上的支持和保护。北京人民则对辛亥革命感到欢欣鼓舞，革命党人除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相配合外，继续采取暗杀的手段，1912年1月16日，张光培等人在东华门大街行刺袁世凯，未果，张等3人惨遭杀害。1月26日，彭家珍在光明殿胡同用炸弹刺杀清朝顽固派骨干良弼，良弼被炸死，彭也英勇牺牲。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封建皇帝被推翻了，北京进入了“民主共和”的时期。

三、五四运动前夕的北京社会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和革命不彻底，终于使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4月21日，中华民国国务院在北京成立，使孙中山等革命派提出的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等条件均遭破坏。北京继续作为都城，依然是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中心。

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决定建都北京，仍称京师。所在地为顺天府，辖附近24县。1914年10月4日，顺天府改称京兆地方，辖大兴、宛平、涿县、良乡、房山、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武清、安次、永清、固安、霸县、平谷、顺义、密云、怀柔、昌平共20个县。1915年9月京兆地方又改称特别区。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人口呈增长的趋势。1911年，北京地区总人口约271万人。1917年增至29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2.2%，城区更高达16%，这主要是人口迁移造成的。北京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绝大多数的年份均为负值。

民国成立至五四运动的七八年是中国社会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势态动荡不已的年代，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北洋军阀统治建立的时期，这社会上的种种变化，在国都北京得到了集中的表现。

（一）维护共和制度和力图复辟帝制的斗争。

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之后，立即解散了国民党，将国会议员驱逐出京，篡改了《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有“总揽统治权”，变本加厉地破坏民主制度，推行其独裁统治；并且以日本支持他称帝为交换条件，1915年与日本签订了严重损害我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找到帝国主义靠山后，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活动更趋加紧。在组织各种名目的君主立宪“请愿团”、修宫殿、备龙袍之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准备在1916年1月1日登基，改年号为“洪宪”。恢复帝制一举，完全暴露了袁氏的野心，很快全国各地纷起讨伐。6月，袁世凯在全国上下一片唾骂声中，气病交加，仅仅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就一命呜呼了。

1917年6月，清廷余孽、军阀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争权夺利的“府院之争”的时机，纠合5000“辫子兵”入京，在控制了电信局、车站及通往紫禁城的要道之后，立即宣布解散国

会。7月1日，清室复辟，末代皇帝溥仪“重登大室”。但复辟不得人心，十几天的功夫，张勋的军队就被击溃败，一场闹剧烟消云散。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地的军阀纷起，混战连年不绝，中国处于分裂混乱的状态，北京则成为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中心和政客角逐的场所。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一届届的大总统，给北京人民带来的只是混乱和劫难。其状正如李大钊所说：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掠夺，使北京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军阀政府疯狂地实行扩军备战，军费成倍增加。1914年全国陆军只有45.7万人，1918年增加到85万人，4年增加近一倍。1918年的军事预算达2亿元以上，为辛亥革命前夕即1910年的1亿元的2倍。这些军事预算，无疑要摊派在每一个老百姓头上。当时军费的实际支出，竟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70%左右，在世界各国及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军阀政府还以国家主权为抵押，大借外债，仅1912—1919年的8年期间，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182项，8亿多元；其中段祺瑞政府在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向日本帝国主义借款达5亿元。

在京郊，军阀、官僚、地主及豪绅，对农村土地实行大量兼并，并无限制地提高地租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盘剥农民，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兵祸，结果耕地大片荒芜，农民纷纷破产。北京城内外的工商业，虽然在第一次欧战期间有较多的发展，但在苛捐杂税、战祸频频的情况下，市场呈现萧条，大批的工商业破产。《晨报》曾刊登夜市营业萧条的消息：“前门大街及西珠市口，各地夜市近来困受纸币之影响，一切营业非常萧条，甚有摆设一夜不名一钱者。闻市商对此深抱悲观，歇业者颇为不少。”根据北京《市政通报》统计，自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的8个月的